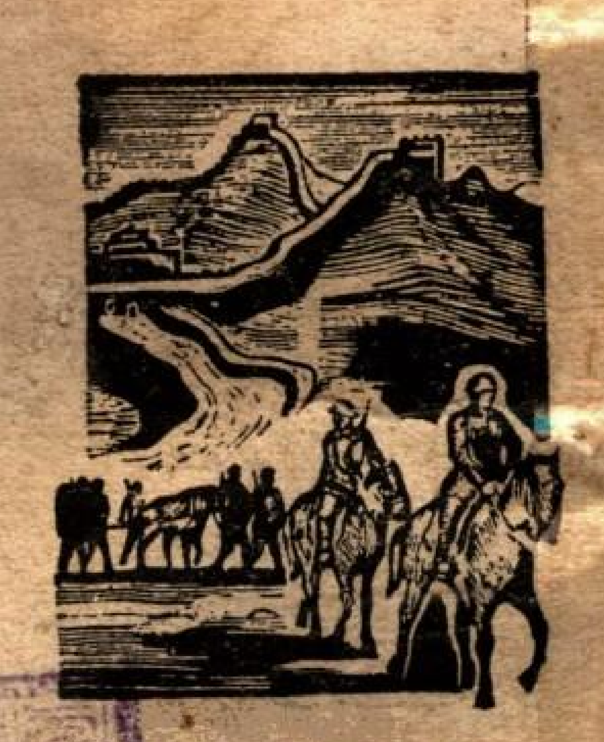
中國第一個由軍閥轉變成革命軍人的一生苦鬥史

朱德自傳

附：朱夫人康克清女士傳



紹源輯譯

大地出版

朱德自傳

附：康克清女士傳

紹源輯譯

重慶

大地出版社印行

上海初版發行

小序

朱德在中國，已跟三國裏的古代英雄們一樣變成傳奇式的人物了。進退迅速，難以捉摸的軍事行動，在敵軍看來，正如幻景一樣不可思議，而特別迷信的人們就說這作爲共軍總司令的朱德是一個魔術家。朱德的形像，被裹在各種富有色彩的幻想的外衣裏，中國人總喜歡用這種幻想去裝飾他們的民族英雄，例如「日行千里」，「眼見萬里」，「任何兵器都不能傷害他」等等。有些比較可靠的關于朱德的故事，甚至被他自己的同志們在紅軍裏傳說着，他們所說述的朱德的生活史，彼此絕不相同。直到今天，一切關於朱德生涯的報導都是不完全的，因此我非常榮幸，竟能從他自己口中獲得此種報告，以糾正那些「傳奇」。

著者（一九四六，二月，編譯於北平。）

目次

附錄

第一章

我的誕生

我於一八八六年生在四川儀隴縣馬鞍莊。我的家族是窮苦的佃農。爲着一家二十口的生活。我們租了二十畝田。我六歲時，進了一個姓丁的地主的家塾。他要我繳學金，待我很壞，好像他開這個家塾是一種慈善事業似的。我在家裏吃飯，在家裏睡，每天得走三里路。放學後，我做各種勞作，如挑水，看牛等等。我在這個家塾裏讀了三年書。

在地主的壓迫下，我們這個大家庭再也過不下去了，爲了經濟困難，我們各自分散了。我被過房給一個叔父，到大灣跟他同住。我自己的父親待我很壞，但這個叔父却愛我如同愛他自己的兒子一樣，送我進學校，唸了六七年古書。全家只有我一個人受教育，因此我一面讀書，一面又不得不做各種勞作。

我在一九〇五年考過科舉。在一九〇六年，到了順慶縣，在一個高等小學裏讀六個月書，又在一個中學裏讀六個月書。一九〇七年，我到成都，在一個體育學校裏讀一年書，於是回到故鄉儀隴縣，在本縣高等小學裏教體操。

一九〇九年我到雲南的省會雲南府，進雲南講武堂，直到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發生後才出

校。我的志願若想做個軍人，而這個講武堂恐怕是當時中國最進步，最新式的了。他收學生很嚴格，我竟被錄取，非常高興。

那時我一向崇拜現代科學，覺得中國需要一個產業革命。我做小孩子的時候，太平天國的故事給我很大影響，這是織布匠們和別的巡行的工匠們講給我聽的，他們在當時是新聞的傳播者。一九〇九年，我進講武堂不到幾星期，就有一種革命的傾向，因此加入孫中山的同盟會。

〔譯註〕世界上有兩種不同的見解，沙士比亞主張人們的姓名是無關重要的事情，我們的孔老夫子卻與此相反，他主張「正名第一」，所以說：「必也正名乎」。孔子又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見「論語」下册。）

朱德這名字，是適應着孔子的說法的，至少這名字是富有意義的，同時是很響亮的。從另一方面看去，這名字，由於文字上的巧合，與他的思想和生活也極其脗合一致。朱德兩字，可作「赤色道德」解，不過，話得說回來，當他的父母爲他取名字的時候，決不會預測到這名字對於他們的兒子會在日後有如此這般的政治意義的吧。否則他的父母一定會在恐怖之中把他的名字改掉，正如中國小說作者蔣光赤爲避免赤化嫌疑，自動改名爲蔣光慈一樣了吧。

㊂朱德在年青的時候就很有勢力，很奢侈，很放蕩，可是他很能幹。當他過了中年以後，他拋棄了他青年時代的下流生活，戒絕了他深的烟癮，最後甚至於脫離了他的家庭，把

，他全部的命運都貢獻給革命觀念，這個他相信是鼓舞他那時候最高的因子和目的。這個信念的成功，喚醒及改造了他的人格和地位。

在青年時代，朱德是很幽靜的，冒險的，及勇敢的。他很受了小說的影響，水滸傳上「好漢」的故事，及三國演義上英雄的功業，都很影響了他，他在他的四川本地的田野及山地下打過許多次仗。他自然就傾向於戰事生活了。由於他家族的政治勢力的協助，他更保送入雲南講武堂，他是中國第一批受現代軍事訓練的陸軍學校的學生之一。雲南講武堂畢業以後，他就委為陸軍中尉，而投入本地所謂的「洋軍」中，因為它是用西洋操法和西洋戰術的，並不是用中國古法行軍的，及因為武器是用上刺刀的「洋槍」的緣故，所以稱做「洋軍」。

（參看史諾「西行漫記」第十章「戰爭與和平」。）

第二章

軍閥時期

一九一一年，我是一個連長，有名的雲南都督蔡鍔率領滇軍參加推翻滿清的革命，我也加入。

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十月十日在漢口爆發，二十天後，雲南起義響應。我在同一年被派往四川，與滿清巡撫趙爾豐作戰。我們打敗清兵，第二年四五月間回到雲南。

一九一二年下半年，我被任為雲南講武堂學生隊長，並在校裏教授戰術學，野戰術，射擊術和步槍實習。

一九一三年我被任為蔡鍔部下的營長，在中法交界駐紮了二年。一九一五年，我升為團長，被派往四川跟袁世凱的軍隊作戰，打了六個月仗，我們獲得勝利。我升為旅長，部隊駐紮在四川南部長江流域的敍府瀘州一帶。我的部隊是第七師（後改為第七混成旅）第十三混成旅，當時稍有聲譽。不過，我們遭受了重大的損失，在戰爭中半旅以上被消滅了。我在這一帶地方駐紮了五年，不斷地跟反動軍隊作戰，他們是受命於北京段祺瑞政府的。

一九一五年，袁世凱企圖恢復帝制。蔡鍔首先為保衛民國而高舉義旗。到一九二〇年底，我

回到雲南府，攻打反動的唐繼堯，這時，蔡鍔已經死了，蔡鍔是南方最進步的民主派青年領袖之一，他給我很大的影響。

一九二一年，從九月到十月，我做雲南省的警察廳長。唐繼堯得勝歸來，追我追了二十天，我終於帶一連人逃出來。一個同伴也帶一連人，跟我一起逃走，但他被唐部捉住，處以死刑。我帶領一連「雜兵」到了西康，所走的路線正是一九三五年紅軍長征的路線。我們渡過金沙江，經過打箭爐附近的雅州，在會理停駐一下，於是進入四川。

我先到嘉定，於是又到重慶，督軍劉湘和重慶警備司令楊森在這裏接待我，一九二二年六月，同他們看了龍船會。這兩個四川軍閥過後當然被紅軍攻擊。但在那時，劉湘並沒有懸賞買我的首級，卻急要給我一個師長的位置，我謝絕了，因為我已決定找尋新的革命道路，找尋共產黨。

劉湘所以關心我的位置，因為我的特殊戰術已為人們所共知，所害怕。我用以攻擊敵軍而獲得絕大勝利的戰術是流動的游擊戰術，這種戰術，是我從駐在中法邊界時跟蠻子和匪徒作戰的經驗中得來的。我從跟匪兵的流動聚集作戰的艱苦經驗中獲得的戰術，是特別有價值的戰術。我把這種游擊經驗，同從書本和學校得到的學識，配合起來。

我自己帶兵的特殊戰術是這樣的：

我自己體格很强壯，能跟弟兄們共同生活，跟他們密切接觸，因而獲得他們的信任。不管大

戰小戰，我事前總要查勘地形，精密計劃一切。我的主要戰術總是很成功的，因爲細心處理一切，親自領導部隊。我老從一切角度勘明敵人的陣地。我跟民衆保持很好的關係，這給我不少幫助。

蔡鍔是有名的戰術家，他教我許多東西。那時滇軍是新式軍隊，帶着德國步槍。我以爲另一種長官對士兵都很重要的要素，是對政治的了解。有了此種了解，他們才能堅決地爲主義而戰鬥。此外就是經驗——你打仗，打得越多，越能了解政治。

[譯註]㊃本年一月廿五日，在朱德對美聯社延安通訊員的電話中，有如下的一段報道：朱德告訴我：「我出身的時代，中國人正在爲全國的民主革命而奮鬥。我早年就參加了一九一一年推翻滿清的運動。五年之後我加入了反對袁世凱復辟。」到這時，也許他覺得已經成功了，朱德就重新過他雲南官長優裕的老生活。他說，後來有一天。「我覺悟了」。

㊃在民國元年推翻滿清政府之後，雲南的新軍站在一個極重要的地位。朱德率領了一營新兵，立刻顯出他是民國的一員戰將。民國五年，袁世凱企圖恢復帝制的時候，他是一個旅長，他和他的雲南部隊在蔡鍔將軍領導之下，首先揭起了反對的旗幟，這個袁氏稱帝的企圖判定了死刑。這一次，朱德開始爲中國南部各省認爲他是蔡鍔的「四虎將」之一。

從此以後，朱德的聲譽就成立了，他的政治地位就立刻隆重起來，他先做雲南府的警局長，隨後遷雲南省財政廳長，雲南和四川的老百姓都知道當時的官府都備具二個條件；第

一、他們都是貪贓枉法的，第二、他們都是吸鴉片烟的。朱德是兩樣都沒有，生長在吸鴉片烟和喝茶一樣普通的地方，生長在雙親都把鴉片塗在甘蔗上來逗引他們的哭泣小孩的地方，他的成爲一個鴉片鬼，當然是無可避免的。當時的政界都認爲侵呑公款是做官者對於他自己的家庭應盡的責任，他看了他上官的榜樣，他操縱他主持下的各種專利，增加他和兒孫的財富。

他也是一個多妻的人。據說他一共有九個老婆。他爲了她們和他的許多子女，在雲南省城裏造了一座極富麗的房子，我們可以說他所渴望的一切，他都得到了：財富、權力、愛情、子女、罌粟麥，人家的尊敬及一個舒適的將來。實際上，他只有一個眞正的壞習慣，保證他不會覆亡的，他歡喜讀書。（參看史諾「西行漫記」第十章「戰爭與和平」。）

第三章

在上海

離開四川的劉湘後，我搭船到了上海，找尋上海的共產黨。那時候，中國已回到軍閥的封建時期，光景實在黑暗，我很苦悶。我在四川當軍官的最後一年（一九二〇年）我吃上了鴉片煙。一九二〇年底回到雲南，在離開雲南前買了一些戒煙的藥品，一九二一年我向西康作第一次「長征」時，實行戒烟，在到上海的途中，仍在戒烟。到上海時，差不多戒脫了，在上海廣慈醫院住了一星期，我完全根絕了烟癮。

一九二二年爲着找尋中國共產黨而離開四川的時候，我沒有想到怎樣跟該黨發生關係，不過已經決心要同牠取得某種聯係。事實上，該黨剛在幾個月前組成，這是我後來知道的，我對於共產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興趣，是在我自修俄國革命史時被引起的。跟法國留學生的幾次談話也給我相當的影響。我停在四川的時候，凡是我能够得到的關於歐戰和俄國革命的書籍，我都讀過。那時以前，我把全部精力都費在保衛民國的戰鬥上，實在孫中山的民主政治的基礎上。但辛亥革命的失敗，全國形成割據混戰，使我大失所望。我知道中國革命必須更進一步，必須像俄國革命一樣澈底，俄國革命的不斷勝利，又給我以希望。

我在上海找不到共產黨的蹤跡，便到北京繼續找尋。當時孫中山的機關報「民報」的主筆孫炳文也跟我同去找尋共產黨。然而在北京也找不到共產黨員，我又回到上海。

一九二二年這一年間，我從南方跑到北方，又回到南方，像一匹脫韁的馬。北京給我的主要印象是國會的腐敗和可笑的狀態。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又碰到許多學生，其中有些跟我一同旅行，他們的活動給我很好的印象。

在回到上海的途中，我碰到孫中山、汪精衛、胡漢民和其他國民黨領袖。孫氏給我的印象是一個非常誠懇，堅毅，精明的領袖。他要我去打陳炯明，但我沒有答應。他又要我到美國去，但我卻要到德國去研究軍事學，親眼看看歐洲大戰的結果。九月間，我搭船赴歐，經過新嘉坡和馬賽，到了巴黎，和慶幸自己得從埃佛爾塔俯瞰巴黎的全景。

〔譯註〕朱德直到現在，還是一個純粹的現實主義者。他的品性中似乎潛伏着理想主義及革命的氣質，受了讀過的書的影響，及一些留學生偶然說及雲南府的退步的影響，他逐漸地了解民元前一年的革命對於全國人民是完全無關的；這純是一個新的專制政治替代了一個舊的專制政治罷了。再有可說的，就是他厭惡這種政治。他似乎有一種恥辱的感覺，同時他再有和西方英雄爭雄的野心，及使中國現代化的志願，他書讀得愈多，他就愈覺得他自己的無知及中國的退步。他需要研究，他需要旅行。

民國十一年，朱德在雲南時把他的妻妾給資遣散。知道中國的頑固情形的人，特別是在

雲南這封建區域裏，對於這件離婚的事情是不甚普遍的，這也表示了朱德的獨立的及有決心的人格。他離開雲南，到了上海，在上海他碰到了國民黨的許多青年革命家，他就加入了國民黨。也在那時，他與左翼的過激主義者接觸了。他們看他是一個舊軍閥，從雲南封建社會裏來的一個貪官，一個多妻將軍，一個烟癮極大的鴉片鬼，——這樣的人也能夠革命嗎？

接受了他朋友的忠告，朱德就決心戒烟。這是不容易的：因爲他差不多在兒童時代就吸着大烟。但是這個人是有鋼一般的意志的。在和這種毒物奮鬥的時候，也有一個星期睡在牀上幾乎完全失去了知覺；既而恐怕他或許要削弱他戒絕的決心，他就趁了一隻航行長江的英國輪船，向漢口進發。在船上沒有鴉片賣，也買不到鴉片，他在船上在長江裏上下了好幾次，時常在甲板上踱來踱去，絕不上岸，同這個最先的敵人作戰。在船上住了一個月以後，他離開了輪船，這時候他有清明的眼睛，有紅潤的臉面，在他一生的歷程中有了新的信心。他是完全戒絕了烟毒，也就開始了他的新生命。（參看史諾「戰爭與和平」）。

●歐遊時期的生活，可參看本書第四、第五、兩章。（正文與註腳。）

第四章

在柏林

在柏林，碰到樹恩來，（現在是紅軍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和別的同志們。我終于在柏林找到了中國共產黨。我在一九二六年十月間到達柏林，那時年紀三十六歲左右。我一找到共產黨，當場立刻加入，這是一九二六年十月間的事。

我在柏林住了一年，學習德文，於是到哥登根（Gottingen）在那裏進了大學，修了兩學期社會科學——一半是掩護我繼續在德國求學。

我在德國的時期內，經常做黨的工作。一九二四年，我們在柏林組織了國民黨支部。中國青年黨是國家主義的政黨，當時學生分裂成兩個陣營。我同時主編一個用複寫紙的政治週報。後來在中國組織第三黨的鄧演達，當時也在那裏。我出席世界學生大會，而在一九二五年，因與臧戈夫案件有關，被德國警察所拘捕，臧戈夫（Chankoff）是保加利亞的一個反動派要人，有人在一個教堂裏炸他，許多人因而被捕。被捕者共三十名，內有三四個中國人。這是我第一次被人逮捕，僅僅被拘二十八小時。

一九二五年，在柏林爲着援助「五卅」運動，而在一個由共產黨召集的大會中被捕，這是第

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被捕。

這第二次被捕的結果，不過三小時的拘禁。所以我的革命牢獄的紀錄，並不怎樣動人。——恐怕一共不過五十八小時。

那時候，我跟許多在德國的印度人一同工作。許多國學生出席學生大會，我結識不少朋友。我終於由於上述的活動，而被逐出德國。

【譯註】●『許多年來我的軍隊始終爲民主而奮鬥，到這時我才明白民主的目的尙未達到。我就轉向共產黨要求解答。』他這時第三次下革命決心的時候，已是一個四十歲的中年人，謙遜地坐在一羣年青得可以做到他的兒子的知識青年旁邊。他和其中幾個人到了德國去。他說：『在德國，我受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甯的著作，以及我中國同志們討論的影響。』（參看美聯社本年一月十五日延安通訊與本稿。）

●朱德的身體極康健，他的求新知的心極熱烈。跟着幾個中國學生到德國去，在哈諾佛（Hannover）附近住了一些時候。在那裏，他碰到了許多共產黨，在這個時候，他似乎專心研究馬克斯主義，而潛心於社會革命的新學說。在這個研究中他由一個年紀輕到足以做他自已兒子的中國青年教導着——因爲他從來沒有學過法文，他只懂得一些德文，及他是一個外國話說得很不好的人。他在德國的一個『學生先生』告訴我，他是怎樣的熱心，怎樣的有耐性，肯吃苦，有毅力。去研究一個新世界的理想，了解了它的眞理和意義，他丟棄了他傳說

的中國訓練的一切偏見和限制，眞是多麼聰明的一回事。

在這個方法下，他讀了許多世界大戰史及熟悉了歐洲的政治情形。一天，他的一個『學生先生』很興奮地說到『國家與革命』這本書。朱德要求他幫着他唸這本書，從此以後，他對馬克斯主義及俄國革命發生興趣，他讀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及他的其他的唯物論的著作，接着再讀了許多列甯的著作。當時德國的革命運動打動了他，同幾百個中國學生，去參加世界革命的鬥爭。他加入了在德國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支部。

『朱德有一個經驗豐富，紀律嚴明及切合實際的頭腦。』在德國知道他的一個同志告訴我。他是一個絕端樸實的人，謙遜而不自負，他常常請人家批評；他有請人儘量批評的脾氣。他對於共產黨的興趣是從他的同情勞苦大衆出發的，也是這個原因使他加入了國民黨。有一個時期，他是很信仰孫中山的，因爲孫氏是主張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但是等到他了解了馬克斯主義，他覺得孫中山的步驟是太紆緩了。（參看史諾「西行漫記」。）

第五章

回歸祖國

我環行歐洲，到了美國，在美國一直住到一九二六年回中國的時候。

回到祖國，我從上海到漢口，再到四川萬縣。黨曾命令我去領導四川的軍事運動，到楊森的軍隊裏做宣傳鼓動工作，因楊將軍是我的好朋友。這些軍隊是吳佩孚的舊部，楊森是吳氏部下的長官，他們阻撓過國民黨的北伐。然而我勸告楊森把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而終於獲得成功。

我做過這二十軍政治部主任，兼任國民黨黨代表，但未担任軍職。

一九二七年，因楊森態度依違動搖不定，他的軍隊表面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實際上依然跟北洋軍閥有聯絡，湖南的唐生智奉命率領國民革命軍打楊森，

這時，我離開萬縣，到了江西。

【譯註】：後來，他到巴黎去，最後到莫斯科，進了東方勞動大學。一九二五年回到上海。自那時起，他帶領軍隊，這軍隊後來組成了共產黨軍。據說在那時期他服飾也十分簡陋竟至有一次他被敵人俘虜時，他說自己只是一個伙伕，騙過了他們。（參看美聯社通訊員專稿，本

年一月十五日。）

㈣朱德在巴黎住了好些時候。在這裏，他遇了國民黨前驅吳稚暉為中國學生創辦的一個學校。在法國和德國，他坐在年青的德國法國及中國教師身邊，他小心地聽着，問着，辯論着，以求了解。「要現代化，要了解革命的意義」，他的年青的教師重復地對他說，「你一定要到蘇俄去。那裏你能夠看到將來，」朱德又接受了他們的忠告。在莫斯科他進入東方勞工大學，在中國教師指導之下研究馬克斯主義。民國十四年底，他回到上海，從此以後，他在共產黨指導之下工作着，在這裏沒有多少時候，他就擠上了領導的地位。（參看史諾「西行漫記」第十章「戰爭與和平」。）

第六章

在南昌

一九二七年一月間，我加入南昌朱培德的部隊，被任爲南昌軍官學校校長兼南昌公安局長，直到南昌八一事變才離開職位。我幫助組織這個事變，牠是在我的保護下計劃成的。事變後，我被舉爲在事變中組織成的新第九軍副軍長，該軍約三千人。國民黨軍隊第十一軍，第四軍和第二十軍也有隊伍參加事變。

那時候，我跟周恩來，賀龍，張國燾，林柏渠，林彪，徐特立，葉挺以及別的革命同志們一同工作。毛澤東那時不在南昌，我和他見面，還是後來的事。

我率領部隊到了廣東東江，我是革命軍右翼司令。我進攻梅縣的三河壩。葉挺，賀龍進攻潮州和汕頭。

我們在這些區域同時失敗後，我退到福建，再到江西，到湖南。到那時，我第九軍大部份弟兄已經犧牲了。我只有一千二百名弟兄，其中還有許多是從賀龍，葉挺部隊退下來的散兵。

〔譯註〕朱德加入了他老上司朱培德的隊伍。朱培德在國民黨軍隊中的勢力，蔣介石氏之下，就輪到他。民國十六年朱培德佔領長江南部各省的時候，他委朱德做南昌公安局長，同時兼

任軍官學校校長。那裏，他與駐紮在江西更南部的第九軍有了接觸。第九軍中有幾隊兵從前在雲南是由他統帶的。因此計劃好了南昌的八月事變，從那時起，共產黨軍隊揭開了對抗國民黨的長期鬥爭的序幕。直到抗戰爆發，才又宣誓與國民黨走上了一個團結抗日的道路。（參看史諾「西行漫記」第十章。）

第七章

會師井岡山

我在這時幫助組織了一九二七年的湘南事變。我們改名爲「工農革命軍第一師」，擁出紅旗，內有鐵鎚，鐮刀與紅星。在湘南事變期中，我們第一次在我們旗上標着紅星。

六個月後，正是一九二八年五月，我到了江西的井岡山。隊伍增加到一萬人。我們在井岡山腳，建立了最初的根據地。我在這裏第一次會見毛澤東。這是一個非常刺激人心的愉快的場合。

一九二七年冬季，在湘南起事以前，毛澤東的部隊已經開向井岡山。當我退出廣東東江以後，他派他的兄弟毛澤覃來和我取得聯絡。一九二八年前，我跟毛澤東的關係，就只有這一點。

一九二八年在井岡山，我們兩部軍隊合組成新「第四軍」，所以用這名稱，爲要保持國民黨第四軍——「鐵軍」——的大名，牠在大革命中，是我們革命的堡壘。我被舉爲「第四軍」軍長，毛澤東當政治委員。

我們在井岡山停駐了六個月，擊退三次進攻。

這時，彭德懷在平江區起事後，率部到了井岡山。我們讓他守衛井岡山，毛澤東和我率部到

了江西南部，福建，廣東湖南，爲着新政權而實踐長期的鬥爭。

從此以後，我的生活史不過是紅軍歷史的一部份。

【譯註】●一九二八年五月，朱德到達了井崗山，我們的隊伍會合了。我們共同起草了一個計劃，組織一個六縣的蘇區。慢慢地把共產勢力在湖南，江西，廣東邊境各縣中，穩定團結起來，以此爲根據地，再向更廣大的區域發展。不過，這個策略是與黨的建議相衝突的，因爲黨有着急速發展的偉大理想。在軍隊裏面，我和朱德要同兩種傾向鬥爭：第一種是立即進攻長沙，這我們認爲是「冒險主義」；第二種向南撤退到廣東邊境，這我們認爲是「敗退主義。」那時候，我們所看到的主要工作有二：（1）分配土地，（2）建立新政權。我們想把羣衆武裝起來，加速這些步驟。我們的政策，主張自由貿易，寬和地對待被俘虜的敵人部隊，一般地說來，是民主的溫和主義。

一九二八年秋天，井崗山上召集了一個代表會議，到會的是井崗山以北的蘇區代表。在這次會議裏所採取的新路線，朱德和我是完全同意的。從此以後，黨的領袖中和在農業區域裏的新政權運動的領袖中意見上的不協調，纔消除了，黨的一致重又建立了起來。

廣州事變失敗之後，彭湃率領了一部分忠實的部隊，到海陸豐組織了一個蘇區政權，可是因爲接受了盲動主義的政策，不久就被消滅了。不過，它的軍隊的一部分，在古大存指揮之下，離開那區域，與朱德和我取得了聯絡，後來成了紅軍第十一軍的基本隊伍。

在井崗山「反對冒險主義之鬥爭」時期中，第一軍擊退了白軍兩次爭奪山寨的企圖。井崗山的確是我們所要創造的這種活動部隊的絕好根據地。牠有很好的天然屏障，而且所產的穀物，足夠維持小小的軍隊。它周圍有五百里，直徑約八十里。本地名稱是叫大小五井。（眞眞的井崗山，是附近的一個小山，已經早已放棄了）。這是從周圍五個大井得名的——大、小、上、下、中、五個大井，在山上的五個村子，就跟着這五口井而命名的。

我們的軍隊在井崗山會合之後，重行改編了一次。有名的紅軍第四軍創立了，朱德任總司令，我是政治委員。一九二八年冬天，在何健的部隊譁變以後，井崗山又增加了許多軍隊。紅軍第五軍就從這些部隊中產生出來，總司令彭德懷。除了彭以外，還有鄧平（在長征貴州遵義遇害），黃公略（一九三一年在廣西被殺），和滕代遠。

來了這些軍隊以後，山上的情形變得很壞了。軍隊沒有冬天的服裝，糧食也非常稀少。有好幾個月我們差不多靠吃紅薯過活。士兵們呼喊着他們自己作的口號：「打倒資本主義！吃紅蕃薯！」——在他們看來，所謂資本主義就是地主和地主的紅蕃薯。把彭德懷留在井崗山上，朱德衝破了白軍的封鎖陣線。一九二九年一月，我們第一次在山上的逗留，就此告終。

這時候，第四軍開始打通江西南部的鬥爭，發展得很成功。我們在東固建立了新政權，和本地的紅軍會合了聯合起來。

福建會議之後，準備了在江西建立新政權的道路。下一年，就有了一些光明的勝利。江西南部，幾乎全爲紅軍所佔領，中央蘇區的基礎，已經開始建立。（參看「毛澤東自傳」。）

◎賀龍大敗之後，他帶了他的警察及軍官學校學生跟着叛變者一齊向南方進發，在他後面關着的城門象徵着他青年時代的安全及成功的最後結束。擺在他面前的，是長期的和繼續不斷的鬥爭。

一部分的第九軍也跟着朱德走，這一隊革命的隊伍疾馳過汕頭的時候，就佔領了這個地方，旋被擊退，再退到江西及湖南。那時候，他們並不自稱紅軍，他們只稱他們是國民革命軍。自從福建敗退以後，朱德的兵力大部分犧牲了，只剩下九百個人，五百枝步槍，一挺機關槍，和每人幾發彈藥而已。

在這個情勢之下，朱德採取了下面一個建議：和大軍駐紮在湖南南部的另外一個雲南軍司令方希聖將軍聯合起來。希望從政治方面利用他們來抵制×××氏，方將軍本人雖然不是共產黨，他的軍隊中有很多共產黨員。因爲他是雲南人，他也願意給他的同鄉一個避難的所在。這裏，朱德的軍隊就改編爲第一百四十團。他本人就做了第十六軍政治部主任。在這裏，他就逃過了他的生命。

在方希聖將軍的軍隊中，共產黨的勢力很快地擴張着。不多幾時，一個反布爾什維克的

團體組織起來，與××氏秘密聯絡，計劃突擊朱德。一天晚上，他只帶了四十個心腹在一家小旅館內住宿，那個團體的領袖鄒家龍就率領了一隊兵來攻擊他，就立刻開火。那時，天已黑了，刺客也看不清楚他們的目標。當幾個人齊用手槍瞄準朱德頭顱的時候，他很興奮地叫起來，「不要打我，我只是一個廚子。不要打一個能夠爲你們做菜的人！」那些士兵，吊了他們的老胃，躊躇着，把朱德帶到露天來仔細辨認，那裏他被鄒家龍的表弟認出來叫道：「這是朱德！打死他！」但是朱德立刻拔出他自己藏着的武器，槍殺了他，戰勝了他的守衛，逃走了。只剩五個弟兄同他逃了出來。

這個意外事件，解釋了朱德在紅軍中所以有「廚子頭腦」的綽號。

回到團部，朱德通知方希聖，他即辭職。這一次，據說方氏還送五萬塊錢給他，表示好意。因爲反蔣的爭論還沒有明白決定，而這些青年共產黨，對於他的下級軍官及弟兄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是他所不敢輕視的。但是幾個月以後，事實證明，送錢的話是不確實的。這一小部份軍隊只是忠於朱德及他的幾個下級軍官而集合起來的。黨的工作很混亂，路綫沒有確立，戰略也沒有決定。朱德的軍隊仍舊穿了國民黨的軍服。但是它們都破舊了，有許多人也沒有鞋穿，吃極粗糲的東西，有時候甚至於完全沒有東西吃，使得他的軍隊逃亡了一些。但是從廣州方面傳來的消息，建議了一條明確的行動路綫，給他們許多鼓勵。朱德改編他的軍隊成三隊，叫做「農民縱隊」，移到湖南江西及廣東邊境，在這裏，他與田一個過激主義的學

生率領的一隊土匪聯合起來，開始取消租稅，重分土地，並沒收富人的財產。經過了一場血戰之後，就佔領宜章縣做根據地，這一個年青的軍隊，就在大吃南瓜及作政治辯論之中，度過了一冬。

同時，毛澤東的農軍敗退湖南，最後退江西及湖南邊境的井岡山。在這裏他得到匪首王佐與袁文才的援助。這兩個佔有附近三縣，在山上已經築好了別人極難攻破的根據地。毛澤東農工紅軍與朱德的駐地，相當很近，毛氏就派他兄弟毛澤覃來和他（朱德）接洽。他帶了黨的訓令來聯合軍力，他也帶了游擊戰，土地革命，及建立新政權的確定計劃來。一九二八年五月，這兩軍就在井岡山聯繫起來。他們控制了五個縣分，有五萬個信徒。其中四千人的武裝是步槍，一萬人的武器是長槍，大刀，和鋤頭，其餘的都是非武裝的黨的工作人員，宣傳員，或戰士的家屬，包括很多的兒童。

這是朱毛結合的開始。他們創造往後六年的中國南部的歷史，朱德隨着新政權發展的同樣的曲線，成爲一個所向無敵的軍事領袖。

一九三一年，舉行第一次新政權會議的時候，全場一齊選舉朱德做紅軍總司令。在二年之內，建立了四個軍團，有五萬枝步槍，幾百架機關槍。（這大部分是從敵人方面奪來的。）共產黨控制了江西南部大部分的區域及湖南，福建的一部分。加緊的政治訓練開始了，兵工廠建立起來了，共產黨全體都了解初步社會革命的經濟及政治改造了。紅軍制服部

日夜的翻製，供給新的游擊隊應用，革命的道德是强化了。二年多一些，紅軍已經擴充了一倍。

在南方這幾年中，朱德率領了紅色聯軍，打了幾百次小仗，打了幾十次大仗，衝破了五次大圍剿。在最後一次圍剿中，他要抵擋武力（包含重炮隊，飛機隊及機械化部隊）超過他八、九倍，資源超過他許多倍的敵人的進攻。可是他的勝敗的程度是須要比較一下的。我們必需承認，戰術的靈活，巧妙的運動，和隨機應變的行軍，他直接地證明他能夠戰勝敵方的每一個軍官，無疑地，在游擊戰中，他養成了中國革命軍隊的堅强的戰鬥力，。紅軍在南方的大錯誤是戰術的錯誤，這是政治領導必需負極大的責任的。雖然有這些錯誤，紅軍在第五次圍剿中，無論在那一方面，仍舊能夠抵住敵人的進攻。

上述的純粹的戰略及大軍撤退時戰術的運用，朱德在長征中的優越的領導，在中國是空前的事。領袖的吸引力和那少有的人類品性，感動了他的弟兄，使他們絕對信仰和忠心，敢爲主義而死，——這是必定要歸功於紅軍的不能擊破的團結力，使得他的軍隊在嚴寒凛烈的西藏高原抵抗「圍剿」，祇吃犛牛，度過了艱難可怕的冬季。

難怪中國謠傳他有各種神奇的本領：能夠看清楚周圍一百里以內的東西，能夠飛行，能夠運用道術，如呼風喚霧、打擊敵人。因爲有千萬個槍子和炸彈沒有打死他，迷信的人相信他是打不死的。因爲國民黨屢次宣布他已被擊斃，並且敘述他擊斃時的詳情，有人說他能夠

復活的，千萬人都知道中國的「赤色道德」，而因爲各人之立場不同，有些人認爲他是惡魔，有些人認爲他是燦爛的明星，但是每個人都承認這十年的歷史上是有他的名字的。

可是人家都說，朱德的相貌並不動人——一個鎮靜，謙虛和說話溫文的人，大眼睛，（和善的眼睛是他普通的表情），個子很矮，很胖，有着鐵一般的臂膀和腿。他自從和賀子珍女士結婚以後，他就停止計算他的年齡了。她是一個骨骼極大的農家女，是一個好的槍手和騎師，她是一個統帶她自己的游擊隊的巾幗英雄。她肩上帶着受傷的同志，她將和男人一樣粗手大脚的女子，很率直的，健康的和勇敢的。（參看史諾「西行漫記」第十章。）

第八章

生活

關於我個人的私生活，我在參加共產黨以前結過兩次婚。第一個老婆死了，第二個還活着。第一個老婆生了一個兒子，但我不知道他現在的下落。一九三五年長征時，我在報上看到我的兒子（那時十八歲）爲要保全自已的生命，已離開他母親的故鄉（瀘州附近的地方），我的第一個老婆是師範學校的敎員，天足，有贊助革命的進步思想。我們結婚的時候，我二十五歲，她十八歲。我第三個老婆是在一九二八年湘南事變時期內跟我同居的，她名叫吳玉蘭。她被湘南主席何健捉住，被砍了頭，目前的老婆康克清是在一九二八年同我結婚的。

關於我有百萬家財的傳說，是不眞確的。我在雲南有些財產，但並不多，我的老婆也稍稍有一點。我一九二一年被迫離開雲南時，唐繼堯沒收了我的財產。

〔譯註〕據朱德夫人康克清女士自述中說：我以爲他的基本特徵就是天性極端溫和。其次他對一切大小事情都很負責。再次，他喜歡跟一般戰鬥員共同生活，時常跟他們談話。

他眞正爲士兵羣衆所愛好，因爲他過着普通士兵的簡樸生活，必要時也做着同樣的工作，的綽號叫做「伙夫頭」，因爲他像一個普通的戰鬥員。他於一九二七年開始獲得這個綽號。

他那時在湘南茶陵。一天晚上國民黨軍隊實行襲擊，朱德登在一座小房子裏，身邊只有一個警兵。敵兵進來了。問「朱德在哪裏」？朱同志立刻站了起來，指着下街。說：「他不在這裏。我是伙夫。我知道朱德仍在下街。」當敵兵慌忙去找他的時候，朱德乘機逃走了。

朱德對弟兄們說話非常簡樸，他們都聽得明白。有時要是他不十分忙，就幫助農民們種田種地。他常常從山谷搬運穀物到山上。他非常強健，什麼東西都能吃，不需要任何特殊食物，只要大量辣椒就得了，因為他是四川人。他晚上非到十二點鐘不睡，早晨老是五六點鐘起牀。

他喜歡運動，同時又喜歡讀書。他細心作出有計劃的讀書表，熟讀政治經濟書籍；現在每天溫習一點鐘德文，還在學校裏教書。他喜歡跟朋友們談話，有時也開開玩笑，雖然不像毛澤東那樣幽默。

他不常發脾氣，我從沒有跟他吵過嘴，但他在戰陣中卻要發怒。作戰時朱德老在前線指揮，但從沒有受過傷。（參看威爾斯女士「朱德」一節。）

㊁朱德對待弟兄的忠心是人人知道的。自從當了紅軍總司令以後，他的衣、食、住、行，都和士兵一樣，同嘗士兵的辛苦。早期常常赤脚走路，有一個冬季專吃南瓜生活，另有一個冬季，專吃犛牛，永遠不叫苦，很少生病。據說他最喜在軍營裏散步，同弟兄坐在一起講故事，或同他們遊戲。他乒乓打得很好，籃球也打得不弱。每一個士兵都能夠直接向總司令

訴苦，——事實上常是這樣做的。朱德叫他弟兄的時候，就脫下他自己的帽子。在長征的途中，就把馬借給疲乏的同志騎，自己走很長的路，一些也沒有倦容。

可是做了紅軍的犧牲的人。無疑地看他是人類的一個惡魔。階級鬥爭不曉得慈悲的。許多紅軍的恐怖故事，現在沒有人相信了，但是認爲朱德不知道殺人有時候是一種「革命的需要」，也太嫌忠厚。爲了完成他的任務，他就得把他自己的忠心整個獻給被壓迫的民衆，在這個任務中，他不能夠比授權給他及他所服從的民衆更爲慈悲。所以除非你相信民衆不殺人，朱德手上不是沒有鮮血的，但是你把它看做外科醫生的血或是劊子手的血，那就要看你自己的哲學或宗教，偏見或人類的同情來決定了。無論如何，朱德不是聖人，但是在他自己的民衆中，在中國極大多數勞苦大衆中，他是一個高舉着解放火炬的可愛的人，他的名字在爲中國人類自由而鬥爭的人中，已經是不朽的了。（參看史諾「西行漫記」第十章「戰爭與和平」。）

●美聯社記者於本年一月十五日延安通訊中說：朱德今年六十歲，和他某時期的革命夥伴蔣介石將軍同年。但兩者的相似處僅止於此。當你坐在他這斯巴達式的簡陋的窰洞裏聽他說話的時候，你就很難記起這個不拿薪水和衣服簡陋的革命家，曾在二十年以前放棄了榮華逸樂的生活，而成爲一個全世界最偉大的游擊戰首領，他留給你的最大印象，是具有難得的友愛熱誠的一個可親的長者。你愈看到他的日常生活——吃飯時靜靜的坐着，看中國戲或美

國觀察組的電影時自在地鼓掌或歡笑——就似乎愈難相信在他的身上，蔣介石將軍曾經懸賞過二十五萬元——這懸賞，出人意外地，還沒有取消呢。

但是這個設令緝拿的人卻在延安確實不帶衛兵且不帶武器地走來走去。他的士兵們簡直是崇拜他。他是中國共產黨中最奇妙的人物之一。我看見他穿着一套褪色的制服，一件皮領舊大衣，戴着一頂軍帽，兩旁的耳罩反轉結在帽頂上，向每個軍人銳利地一瞥，這樣是最叢人愛了。他唯一的徽章是一個藍白色的國民黨軍章。雖然他的等級相當於美國的五星大將，但他毫不冷峻或高傲，他熱切地聽人講話，常常請人家批評。（參看美聯社專稿）

第九章

抗戰與勝利

只等中國得到團結自由和民主，我準備立即解甲歸田。

我希望中國一九四六年就能夠得到這些。關於他的作爲革命家的悠長事業，他說：「我曾經幫助大家在華北此地耕殖一塊土地，讓人類可以生活在上面而免於逮捕和恐怖，可以自由實施民主的自治」。

我的生命沒有白費。我在華北這裏，耕植一塊人類可以住在上面而不怕被捕和恐怖的，有自由實施民主自治的土地。我能夠活着看到目前生活在混亂和壓迫下的中國其他各地，正在要求我們樹立了的民主，我爲此而感激不盡。

我很讚慕兩個德國人——興登堡和麥鏗遜（Mackensen），後者是運動戰專家。貓臉將軍在保衛法蘭西方面也建立了燦爛的功勳。現在，蘇聯的紅軍司令官們，當然是最有經驗的一等將軍，例如加倫（白魯徹。）就是其中的一例。

拿破崙，在舊式將軍中，也是很不錯的一個。我小時，很喜歡拿破崙和華盛頓。美國革命中農民志願軍的成功，大大地刺激了我，我知道，中國農民也有一天會同樣得着自由獨立的可能

的。

在中國，我一向欽佩雲南的蔡鍔，他是現在軍事科學最優秀的早期專家。而在政治方面我一向很敬服孫中山。

中國的士兵並不壞，壞的是軍官。中國士兵只缺少政治訓練。如果中國士兵受了適當的訓練，他們將成爲全世界最優秀的戰士，因爲他們能夠忍得住任何困難，能在精神和肉體兩方面最困難的條件（此種條件會粉碎任何其他民族的戰鬥力）下保持元氣——正如中國的苦力在忍苦耐勞方面無敵於全世界一樣。

「在今後五年內，中國只能供養少數軍隊，故而美國的駐華軍事顧問團是不需要的」。

假若在此後五年內。中國的經濟收入，用來維持五十個或一百個機械化師團，那末，中國人就沒錢穿衣吃飯了。只有在健全的工業基礎上，才能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因此，以軍人的地位說話，我歡迎美國供給中國以經濟專家，工程師和技術人員的顧問團。

將軍的回答，是因爲國家養不起更大的軍隊，就只能以小軍隊來對付。中國如有五年的喘息時期，將能夠建立一個『充實』的軍隊，足以抵禦任何侵略者。

停戰的日子，是中國享受十八年來第一次安寧的一天。那天各地前線都平靜了，國共雙方無戰事。

實行憲政爲全國人民一致的願望。歷史已經證明國家團結，祇能於民主立憲政府成立後，始

能確保。蔣主席也曾經聲明，希望各黨各派永久合作。我們共產黨已贊成於新國府委員會成立後實行軍隊國家化，所謂軍隊國家化，如不變成國民黨軍，則共軍在事實上早已國家化了，因爲我們只知服從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原故。

〔譯註〕●本年二月三日，朱德將軍在延安慶祝和平民主大會席上，曾作了一次廣播演說，其內容約如下述：

今天我們開大會慶祝和平民主。我們中國人民，求和平求民主已經有很長遠的歷史了，直到這一次，一月十日才由蔣主席和毛主席命令國共雙方停止內戰，實現國內和平，一月卅一日，才由政治協商會議決議改組國民政府委員會，改組行政院，通過修改憲草原則，通過和平建國綱領，確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的基礎。雖然停戰以後，各個地方還有一些個別的零星的衝突發生；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實行起來，還會有更多的波折；但是從大局方面來看，國內和平局面是已經確定了，全國民主化的方向，也是已經確定了。我們的國家，從此已走上了和平民主與建設的新階段。這個事實，已經不能抵抗了，已經不容懷疑了，這是中國民主革命一個非常偉大的勝利。我們今天就是要來慶祝這個偉大的勝利。

同胞們，同志們！今天的這個勝利，是怎樣得來的？從根本上說來，這個勝利是中國人民一百年奮鬥的結果，是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一切民主力量二十五年奮鬥的結果，是解放區人民和軍隊八年奮鬥的結果。也就是說：今天到會的每一個人，對於今天的勝利都有貢獻，

都有功勞，特別應該指出：多年以來，我國無數的志士，無數的先烈，爲了和平民主的目的，不知經歷了多少艱難險阻，不知拋了多少頭顱，流了多少鮮血。由於他們前仆後繼，百折不撓。他們的遺志今天已經開始實現了，他們今天可以瞑目了。沒有他們的奮鬥犧牲，要達到今天的和平民主的局面是不可能的：要開始全國規模的經濟建設，使國家走上工業化，是不可能的。我們應該向他們致敬！就停戰談判和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的直接原因來說，這是國共兩黨及民主同盟各黨派與全國無黨派的民主人士共同努力，團結合作，互助互讓的結果；這又是美蘇英三國政府與人民一致努力，特別是馬歇爾將軍直接參加國共談判，他們與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共同促成中國和平民主的結果，因此我們應該向國民政府蔣主席致敬，向中國共產黨毛主席致敬！向國民黨代表張羣，王世杰，邵力子，張治中等先生，共產黨代表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葉劍英等同志，民主同盟的各位領袖，無黨派的社會賢達致敬；向杜魯門總統，斯太林元帥，阿特里首相致敬！向杜魯門總統的特使馬歇爾將軍致敬！

現在國內和平已經實現，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民主化的決議也已經通過，我們的任務是什麼呢？我們的任務，就是使政治協商會議的一切決議澈底實現；使民主政治一步步實現；使國內和平一天天鞏固；在全國範圍內造成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環境，以便全國人民從事經濟建設，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大家都知道，無論什麼好決議，既不會自己產生，更不會自己

執行。我們過去已經作了極大的努力，產生這些決議；今後還要更大的努力，來實現這些決議。蔣主席在政治協商會議閉幕的時候，向全中國全世界作了鄭重的諸言宣佈他一定堅決忠實的執行政治協商會議的一切決議，堅決的忠實的實行和平建國綱領。我們歡迎蔣主席的這個諾言，我們擁護蔣主席實行政治協商會議一切決議，實行和平建國綱領。但是，大家知道，在世界上不但有美蘇英各國援助中國和平民主的人們，還有日本侵略者的殘餘勢力和其他陰謀破壞中國和平民主的人們。在中國不但有願意執行停戰協定和政治協商會議一切決議的人們，還有日本侵略者的走狗——漢奸偽軍，親日派，內戰挑撥者和其他陰謀破壞停戰協定和政治協商會議一切決議的人們。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和國民黨各黨派與無黨派的民主份子，和國內外一切擁護和平民主的人們親密團結，長期合作，來實行停戰協定和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保護和平，促進民主，不讓任何人加以破壞。中國共產黨已經準備參加政府，以便站在負責的地位，來與各黨派合作，實現這些決議，保證國家的民主化。我們不但要實行已經通過的這些決議，因爲這些決議的實行還只是全國民主化的開端；我們還要和全國人民在一起；繼續努力，實行進一步的政治改革，軍事改革，經濟改革與文化改革。全國的政治徹底民主化，全國的軍隊徹底國家化，使三民主義徹底實現于全中國，使中國成爲近代工業化的國家，使中國成爲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新國家。

我們解放區的人民與軍隊，在這個偉大的事業中，要作極重要的工作。我們已經徹底執

行、停戰令，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和平建國綱領，它們的大部份內容我們都已執行了。但是，我們現在還要根據這個標準，來實行檢討一次，我們各方面的工作，看我們已經執行的是否還不完滿，還有缺點；如果還有，就應當決不遲疑的加以克服。那些還沒有實現的，我們應當絕對忠實的去貫澈實行。我們解放區的軍隊，從開始就是不要錢不怕死，全心全意服務於國家民族與人民的軍隊。除此以外，我們的軍隊不知道任何個人的黨派的私利，中國共產黨為了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經過種種艱難困苦，創造了發展了一枝國家的人民的軍隊，這就是今天的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抗日縱隊。現在國家民主化已開始實現，我們的目的已開始達到，這些軍隊即將成為統一的民主國家的最忠實的服從者與支持者。中國共產黨將一如中國國民黨一樣，即將停止在軍隊中黨的組織的活動。我們無論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在軍隊國家化方面，在國家經濟建設方面，都要力求成為全國的模範，我們一方面要自己加倍努力，把解放區建設得更好；另一方面還要努力參加全國範圍內的民主事業與建設事業，推動其迅速前進，把全中國都建設好。我們的責任是嚴重的。是的，解放區的工作還會遇到很多困難，因為解放區本來是全國經濟與文化比較落後的地區，又受了戰爭最嚴重的摧殘；但是，只要我們全體軍民團結一致，堅持和平民主的方針，我們就有信心戰勝一切的困難；有信心完成我們的嚴重任務，像過去我們在八年抗戰中所做過的一樣。解放區在今後和平民主建設的新時代中，將有偉大的發展前途。全中國在今後和平民主建設的新時代中，將有偉大

的發展前途。

〔譯註〕●自從一九四〇年以來，他就沒有離開過延安，但是關於他的傳說常常引起人們的幻想。國民黨軍隊時時說他在歸綏以至瀋陽各地指揮軍隊，他們曾經殺死，埋葬，又使他復活過六次之多了。近來重慶的團結談判，使他必須參與黨的重要決策，和指揮他部下共產黨號稱的一百三十萬大兵，因此他整天非常忙碌。在一九三七年成立聯合戰線的時候，他曾親自在河北，山西，河南前線指揮作戰。但是過去五年中，他的司令部一直設在延安。他在共產黨叫做『黃家坪』的一條窰洞和住屋裏決定戰略。在延安，他仍舊遵守他過了大半生的軍事生活。他常常步行九哩，進城去會見黨的領袖們，他貪婪地閱讀書籍和報紙，並由外文，廣播，和報紙的譯文緊緊地研討國際形勢。

他常常抽出時間來盡情發展他對孩子的愛。他腳邊總有一小孩纏住他。現在最得他寵愛的，有個十一歲的怕羞的女孩，這女孩一聽人說到重慶，愉快的眼睛就要痛苦地暗澹下來。她的父親就是葉挺——前新四軍軍長——在一九四一年被國軍俘虜的。（按：葉挺將軍已於本年三月由政府釋放了。）這孩子曾和她的父親一起在監牢裏過了三年，替他煮飯，補衣，照顧他。（參看本年一月十五日美聯社延安通訊員專稿。）

●共產黨管理邊區的行政骨架是邊區政府，政府的背後當然是武力。從種種方面看起來，黨在軍隊裏的活動遠比政府上的活動普遍而深刻，朱德將軍的部屬，在邊區內穿的是紅

軍裝束，可是一到邊界以外，就換上了國軍的武裝與番號；但是不管他們以何樣身份出現；它和邊區政府似乎沒有法定的關係；它當然不隸屬於邊區政府，因爲邊府始終是地方規模的組織；它也沒有將十八集團軍的名義，正式拿出來應用，爲了滿足我們對於那方面軍隊的理解，葉劍英參謀長曾向我們記者團做了五小時的報告。那報告的總題，就叫做『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單看題目，我們可以知道他們是把這一支武力的所有成果記在『中共』的賬上。換一句話說，他們並不諱言這軍隊是黨的武力，只有黨可以指揮它，只有黨，有權領導它。而且，它的規模也是普遍性的。朱德將軍的司令部在地位上比邊區政府高得多；與邊區政府平行的軍事機關，應該是賀龍師長所指揮的留守兵團。

關於這一支武力，我個人所知道的太少了，葉劍英參謀長的報告，純爲敵後抗戰情況，超出了我敘述的範圍。只好從略，關於邊區的部隊，我們只得到一些靜聽的資料。倘說我個人參觀所得，則他們在生產方面所給我的印象，比他們的戰鬥訓練更爲深刻。

邊區的武力組織，有如一座金字塔，要了解它，須得從金字塔的底面看起。這一個底部，就是廣泛的民間武力，它的通俗名稱是紅纓槍，官名是自衛軍，在從前叫做赤衛軍。所有十八歲以上的男子，都得參加，大概是沒有規定的軍服的，但是白衣，白的頭巾，腰間札一條布帶子，握着紅纓槍，很有引人的魅力。現在是，連八九歲的男孩子也鬧着紅纓槍的把戲了；這些紅纓槍在邊區內共有十四萬人，合起來每一鄉有一連，連長是縣府派的，至於地

們的任務平時只是放哨，查路條，緝獲那些漢奸小偷；作戰的時候可以做担架運輸等等的任務。

比紅纓槍高一層的武力，叫做基幹自衛軍，他們是從紅纓槍裏面挑選出來的，凡是身體結實，思想可靠的紅纓槍，被共產黨的幹部看中了，就設法鼓勵他充當基幹自衛軍，他們的裝備，比紅纓槍好得有限，但是軍事訓練的時間卻多得多；平時不脫離生產，戰時可以上火線，不過，以不離家鄉爲原則。這一層武力，據說邊區有四萬多人。

再上一層，是保安隊，還是從前的游擊隊改編的，是正正式式的軍隊了，具有常備軍的性質，而又有地方軍的色彩，人數不清楚。

頂上一層，就是正規軍。現在我們只知道有三個師，便是有名的賀龍師，林彪師，劉伯承師，總數據說五萬人的樣子，但駐在邊區的數目多少，也不清楚。正規兵的補充，大概就由基幹自衛軍中挑選，用政治工作獎勵他們入伍。抗戰以後入伍的，據說有七千五百人。

所有在邊區的部隊，並不由朱德將軍直接統領，是由一個留守兵團所掌管的，留守兵團的組織相當大，司令官是賀龍師長。

邊區流傳着關於他的許多故事。尤以軍中爲甚，據說陝北過去三年必有一旱，但是這幾年四年年豐收，老百姓奇怪何以旱神久未光臨，後來就得到一個解釋，說活龍來了，怎會有旱災呢！老百姓把賀龍當作「活龍」，眞是無稽之談，但很可以看出他的威望正與日俱增，

他的性格和他的相貌很不相稱，照相貌看，胖胖的有一撮東洋鬍子，頗具威儀，應該是一位優雅溫和的紳士，可是他的性格却是剛烈憤激的。在王家坪聚餐中談到他們的軍隊，他吐露出最激昂的不平之鳴，越說越氣終至於不終席而去。

雖然對於軍事我是外行，但如果專從裝備武器上來衡量他們的武力，那簡直是無可注意的：他們有些什麼武器呢？手榴彈，擲彈筒，七拼八湊的步槍，如是而已！機關槍就已被他們視為珍品了，小型的炮也有些。大炮重炮就只有充當陳列品了，因為沒有炮彈。坦克車隊還是夢想，連步槍都不够分配呢！所以武器註定他們只能打游擊。在那廣大的平原中崎嶇的鳥道上，和敵人做捉迷藏的遊戲。

因為武器的簡陋，便只得從人力上發揮，這和他們的生產運動是同一作風的。要組織人力，提高人力便有黨幹部來參加軍隊的『思想武裝』工作，這制度在師旅部的名稱是政治部，團是政治處，各設主任，再下級的，團有政治教導員，這是幹經常的政治工作的，屬於總政治部。另外，師旅部中還有一位黨方面直派的政治委員，是代表黨來確定師旅部的整個政治路線的，在連以下，還有黨支部，支部的書記，一般即兼任政治指導員，所有部隊的重要行動，指揮官的命令都須得到政治委員的連署。這就是共產黨所賴以確立軍隊領導權的一個樞紐。

政治部的工作有許多特點，它不僅施行士兵教育宣傳，同時還有審查思想的組織，士兵

教育分文化科與歐清科。前者是識字寫作，後者是政策宣傳；每連的軍人俱樂部，也不止是一個文化娛樂的機關，許多工作，如爭取逃兵、防奸、和其他羣衆性的工作，都通過俱樂部來做。爲了糾正幹部思想，有些部隊還設有『反省班』，各連隊每年有兩三次的『反省坦白』運動，讓每個幹部與士兵盡量宣布他的不滿與不平，同時誠實招認自己的錯誤，供給上頭參考。各部隊還選有各種英雄，作爲好的典型，極力鼓吹，以代替空洞抽象的教訓。打罵制度，原則上是禁止的，但並未絕跡。一般都以爭取感化代替懲罰，用積極的獎勵代替消極的制裁。最好的士兵，大概都被吸收進黨面去了，同時各部隊也一定有許多黨員參加，在裏面做榜樣。對於民衆，惟一的原則是爭取，其方式與一般羣衆工作沒有兩樣。

在政治機構方面，共產黨的勢力是潛在的，並沒有法定的控制形式，但在軍隊領導方面，共產黨萬分仔細，不允許有絲毫的鬆懈。軍隊裏有黨組織，有政治委員，有政治部主任，還將軍隊中的黨組織和各級的黨部緊密的聯結起來，從三十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議上，我們可以看到，他們使軍隊中軍政委員會及政治部，成爲同級的黨委（中央局、分局、區黨委、地委、）的一部門，和組織宣傳各部並列，這樣，軍隊的黨是直接由同級的黨委來領導了。然而他們覺得這樣還不够嚴密，他們進一步決議；爲統一地方黨與軍隊黨的領導，以後黨中央分局，區委，地委的書記，兼任軍區，分區，師旅部的政治委員。這就是說，由各級黨部的最主要的負責人來直接担任軍部的政治委員。自然的結果是：『軍隊必須執行各

級黨委的決議，無條件的服從共產黨的領導』了。

軍隊和『邊區政府』差不多是通過黨組織來發生聯繫的，軍方的首腦，大概都被邀請到各級的參議會去佔一個位置。依他們的選舉法，士兵是有選舉權的。

去年以來，共產黨又發起了兩個運動，一個是軍隊裏的『擁政愛民』運動，一個是政府與民衆的『擁軍』運動。到處牆上寫着這兩種『公約』。各處部隊，召集民衆開會，向民衆大大的『坦白』，將過去對不起民衆的地方一一招認而最後加以道歉，各部隊派人到民衆調査，凡被軍隊借過東西損壞過東西的，開出來的酌量賠償，今年正月，那些官兵還到民衆家裏去拜年，送年畫，約老百姓吃年飯，開歡迎會，有時也幫助農民鋤草收割。還有，過去侵佔來的民地，也査出來退還原主，這叫做『擁政愛民』。

老百姓方面，爲着『擁軍』，他們幫助駐軍耕種熟地，種子，農具，糧食等等。還有送豬，送羊，送柴炭，鞋襪以及鈔票等等的慰勞。而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優抗工作，抗屬的生活，由地方民衆保證，沒有田地的，調劑他的田地，缺乏勞動力的由民衆代耕，同時由勞動英雄等出來幫助抗屬經營副業，『建立家務』。據去年的統計，邊區民衆爲抗屬代耕的土地有十五萬畝，享受代耕的抗屬有一萬七千多人。不過，優抗的主要目的在使抗屬能够生產自給。非完全缺乏勞動力，多少總得自給一部分。

一般士兵的生活，吃穿大體都過得去，可是生產工作也够辛苦，因此逃兵也時常有的。

不過他們處置逃兵的方法，並非懲罰槍斃，而是動員本地的民衆，請他「歸隊」，一個兵逃回來，會有鄉村長勞動英雄等天天來說服他，逼得他非歸隊不可。原則上，歸隊工作由地方幹部負責，軍隊不能直接下鄉提人，至於實際情形是否做得這麼好，我們也無從證明。

綜合上面的觀察，我們可以認識第十八集團軍的特點，第一個是黨化，第二是對於軍民關係的政治工作，也做得徹底。如果單用武器的標準來估計它的力量是要失敗的。（參看趙超構「延安一月」）。

附：朱夫人康克清女士傳

我的母親每年生一個女孩，而七個女孩中，有六個剛生下來就送給別人家，因為我的父親是一個窮苦的漁夫，要養活他那三個男孩已够困難，自然不願意多養他所不歡喜的女孩子。我們並不是賣出去，而是送給人家，在長大後當他們的奴婢，農事的幫手，和家庭的僕役。我是一九一二年生於江西萬安的老塘灣的，生下後，一個月就送給一個農民家養。這農民沒有孩子，跟他的雙親和三個兄弟一道過活。他自己是一個窮佃戶，二個兄弟是傭農，另一個兄弟却有一個老婆，一半在家操作，一半給地主傭用，我們這一家全都辛苦地操心維持生活。我一到了可供役使的年齡，便撿拾柴枝，看顧畜牲，和割野草喂豬。因為這農民和他的老婆成天在田地裏工作，所以到了十歲，除一切的家務全由我處理外，還要到田裏做工，和織草繩換錢。

在我十四歲的時候，縣裏起了幾次水災和一次饑荒，因此我們不得已拾棄了農務，全家實在窮不可耐。就在這時候，剛好是一九二六年，國民黨開始北伐，有一個國民黨的工作人員（亦是共產黨員）到我們縣裏來，向農民們說明農民的問題。我的養父馬上受了他的影響，當了鄉里隨後組織起來的農民協會主席。我亦幫忙他在老塘灣做這工作，自己則加入同年由國民黨組織的婦女協會。

雖然我只有十五歲，而且在一九二七年我還不會讀和不會寫，但我却充當區裏十村的少共團的工作視察員。我在加入少共團之後，就當了少年先鋒隊的隊長，而恰好在這時候，大革命失敗了國民黨開始清黨，為着逃難，我藏匿在離我們家約五六十里的山上。國民黨拿着一張必須捕捉

歸案的共產黨員嫌疑犯的名單，告訴村裏的人說，要是他們不把我們找出來，全村房子都要燒成平地。要是村裏的人能够保證他們不是共產黨員，那麼當局可以寬赦他們。我的養父和他的一個兄弟都是共產黨員，藏匿在另一個地方。於是村裏的人就託人告訴他們兩人和我說，要是我們肯回家，他們願意保證我們，因此我們三個就回村裏來。然而，許多被保證的人一回村裏來馬上就被捕了，地主正乘這機會報仇。在萬安縣我們這一區裏的十個村鎮中，一九二七年二月被殺的，約計一千人。（下二百五十字略）

在這可怖的階級鬥爭的時日裏，地主們僱用的民團是頂反動的，負責尋覓革命份子，以及執行大部份的酷刑的都是他們。地主們亦幫着追捕，各村的窮人亦被迫幫忙他們，因爲他們如果不這樣做，生命和財產都要發生危險。

我因爲得到村裏住戶的保證，幸而沒有被捕，但在國民黨召集的民衆大會中，有人提出責我要求我到會當衆自首懺悔，我拒絕了。當時村裏的人都圍着我，代我辯護道：「她只是個十五歲的小女孩，懂得什麼呢？她並不懂得她嘴裏說的那些話。」我沒有哭，始終拒絕他們，但心裏却很害怕，因此朋友們都催我趕快回家。有些共產黨員在當時投降了國民黨，但我仍然要爲革命工作。許多同志的被殺，使我心裏非常憤怒，我的革命志願愈加堅決了。我曾跟幾個同志計劃使運動復活，但黨的組織已不存在，雖然區裏的負責同志並沒有遭害，那六七個領袖都逃了。

當時我有了一個新的問題：我的養父雖然是一個共產黨員，但他的思想却仍然是封建的，他

預先議好一場婚姻，要我嫁給一個素不相識的店員，而且已着手準備婚禮了。我想逃走，但養父却把我鎖在一間小房子裏。這時候是一九二八年。在結婚的前夕，村裏的革命者接到紅軍的一封信，說他們就要開到村裏來。接着，我親眼看見紅軍的兵士們村裏開來，我的叔叔告訴我說，他要去參加。我求他帶我一道去，但他拒絕我。紅軍稍作逗留從事小規模的宣傳工作。就在隔天，我由那小屋子逃出來，加入了他們。

紅軍要求本地所有的共產黨員加入，並邀請農民大衆支持他們。我參加這種煽動工作，帶着少年團到農民中演說。但紅軍並不想久駐，接着留下了在當地組成的游擊隊員，便又出發了。我們害怕紅軍開拔之後，白軍又要殺害我們，因此村裏隨軍出發的差不多有一百人。我和六個年約在十九歲左右的女孩（有些是少共團員。有些全未加入組織的。）亦加入了。就這樣，我在十六歲，即一九二八年加入了紅軍。當時我們只帶着槌子和鐮刀，但沒有紅星。

我們參加的是朱德統率的四路軍，本要開往遂川。但白軍已經開到了那地方，所以我們全部開江西寧岡縣的井岡山，這時候是一九二八年八月。井岡山當時是紅軍重要的後方。

從萬安縣加進來的我們這一百人，並沒有正式加入紅軍，都是游擊隊的組織者。我們組織游擊運動。把紅軍的槍分給他們，有許多人還為鄉工作。我是游擊隊的一個領袖，但從未帶鎗，只做組織和宣傳的工作。

我們在井岡山約過兩個月之後，國民黨便進攻井岡山。井岡山是一座險峻的高山，頂上卻是

寶中的，由山路系山頂，要經過五座關，三座是大的，兩座是小的，因此他們的進攻不容易得手。國民黨軍隊由八月起圍山，一直到十一月還不能攻下。接着紅軍主力便下山來，只留下彭德懷的第五軍在那裏守衛。

井岡山上一共約有一百個女人，由我們區裏來的女人却只有十個到十一個而已。

一九二九年一月，朱德和我在井岡山上結婚（我個人六個月前即一九二八年八月，曾在遂川見過他。）當時我是十七歲而朱德是四十三。我們究竟在那一天結婚，我此刻已經忘記了。我們並沒有舉行婚禮。自從結婚之後，我差不多始終跟他在一起，只有在一九三〇年佔領了吉安之後，兩人曾經分別一年。至於我們並非經常住在一起，那是不用說的。我們從未生過小孩，因為恐怕有了小孩會阻礙我們的工作。

當我初次碰到他，並沒有立刻浪漫地對他鍾情。不過因為他生活跟小兵一樣又做着小兵的工作所以非常歡喜他。當時所有的人全都敬愛這位革命的領袖的。我們兩人是最好的同志，但一過了這個過渡期間，我已不能不承認我大概已對他發生愛情了。

當時朱德的妻子剛已死去，她是一個革命的女子，名叫吳玉蘭，一九二八年在湖南的耒陽和他結婚，但在同年年底便給國民黨殺害了。我只在井岡上見過她一次。

八年來我從未跟朱德吵嘴過，有時我給他一點小小的批評，但他平常的行為總是對的，我們兩人亦從未命令過誰。他生病的時候，我把他當同志一樣的服侍他，至於他的衣食，我可從未關

心過，這些是由他的勤務兵料理的。

我們一從井岡山下來，我便是一名游擊隊員，我時常帶着鎗，但沒有打過仗，只做煽動的工作。當時我的思想是：我們必須與所有的優勢者作戰，第二次大革命不久就會到來的。雖然我們當時的處境非常艱險，但我却不怕一切的困難，因為革命不用說時常是一種困苦的工作。由井崗山到吉安，在我個人的生活上，並沒有什麼重要的經驗。

我們留下彭德懷自己的一千人和山上原有的一千個土匪在井崗山。這些土匪是王超和袁文才的嘍囉，他們在紅軍未到之前，就佔有了井崗山，後來才跟紅軍合作。朱德和毛澤東領導的第四路軍，和游擊隊員（只有一百人）。想開向贛州去，而三師國民黨的軍隊，却塡住了到贛州去的大路，所以我們只作了一次小接觸，遂即後退，轉向銅鼓，那裏有一小隊紅軍，即第二和第四派遣隊駐屯，而羅炳輝亦就在這時候領導一隊白軍叛變，加入紅軍來。

在銅鼓附近，我們和兩師國民黨的軍隊接戰，打敗了他們，因此我們安然地開入銅鼓，休養了一星期。接着國民黨的軍隊又向我們進攻，我們便離開銅鼓開到福建的汀州（註）在這次戰鬥中，紅軍殺死了國民黨的一個師長。

我們在汀州住了兩個星期 傅連昌醫生亦加入了我們，這是第一個加入紅軍的醫生；紅軍知道他同情我們，所以把傷兵送到他醫院裏。這時候紅軍亦經過了改編和擴充。在福建龍岩縣附近的小鎮萬陽的游擊隊只有十支鎗，因此第四路軍開到那裏，打敗了國民黨的部隊，再由此佔據了

永定。接着又回到江西，佔了大庾，南康和新豐，這正是李立三路線要求攻打城市的時候。

第四軍不久又開到瑞金，再向閩西進出，佔據了汀州，龍岩上杭三縣，同時並進入粵北的梅縣。我們在梅縣只有一天功夫，曾舉行過一次民衆大會，發覺當地的羣衆都很是革命的。第二天國民黨軍隊已經追到了。我們那時候只有七八千人，和四五千支鎗而已。（在井崗時只有一千支鎗）。

離梅縣九十里，有一個地方叫馬頭，紅軍開到那裏，但國民黨的軍隊沒有攻過來，因此我們又再度進攻梅縣。他們在城內應戰，因為他們的武器比我們的强，因此我們又回到贛南的尋鄔和閩西的武平。紅軍在梅縣時雖然只逗留過一天，當地甚至連商人們都沒有逃走，但國民黨軍隊一開入城內，便殺死了我們許多人。

紅軍即着開到贛州附近的興國，軍隊便在此休養改組，這是一九三〇年前半年的故事。再後曾進攻吉安，但沒有打下他。因為李立三路線命令紅軍進攻大城市，紅軍甚至曾進攻南昌，結果並沒有攻破。接着我們便回到湖南。

二個月後，彭德懷離開了井崗山，一九三〇年八月，他佔領了長沙，停留了十日之後，便開過來與朱德的會合，因此第四和第五兩部紅軍便會合了。兵力大概由一萬人到一萬二千。

（註）按汀州即長汀，而銅鼓却在江西的西北，與汀州相距甚遠，恐有筆誤或原文錯數，恐係雩都之誤。——譯者。

自此之後，第四和第五兩部紅軍便沿着贛江向江西移動，在湘贛邊，打了幾次仗，並且向吉安進發。但我們還沒有到達吉安城，當地三萬個强壯的農民已把該城佔領了。

佔領吉安是一九三〇年八月裏的事。當時我擔任「少年學校」的短期的校長，這學校裏的學生都是羣衆和紅軍中的幹部。我從一九二九年在井崗山的時候到一九三〇年下半年，非常用功學習，開頭先從標語口號之類學起：並沒有私人的教師，結果已能夠讀報紙。現在我已能夠寫寫關於紅軍的工作一類的論文了。我從沒有讀過單行本的小說，但定期刊物如婦女生活之類倒是常常閱讀的。我讀過共產主義的ＡＢＣ，列寧主義基本教程。以及斯太林和底米特洛夫的報告。我對於馬克思主義並沒有很深的認識，現在正在理論方面用工夫。

不久之後，我被任爲總部衛兵團的隊長，這時候，紅軍中只有我一個女人，別的全部擔任政治的工作。我時常帶一支槍，有幾次還令全隊員準備作戰，但戰事倒還沒有參加過。自從我一九二八年離了瑞昌以後，差不多每一天都在戰鬥中。但我一點亦不害怕，雖然我從未曾上過火線。每個女性，一上戰場開頭總很慌亂激動，但後來便一點亦不害怕，我隨總司令部走了六個月，主要的是從事士兵間的政治和教育工作。

六個月之後，我被調到交通派遣隊去，等到「第一次圍勦」結束，又把我調到總司令部來，擔任視察前方交通工作的觀察員。

在「第一次圍勦」和「第二次圍勦」的上半期，我全部時間都在前線上，與朱德在一道，但

工作部門是不同的。

「第二次圍勦」將近結束的時候。我回後方來，在軍火庫工作，我們從國民黨軍隊奪來的槍械彈藥，完全集中在這兒，紅軍的一切軍火完全由這裏取給。當時我們的軍火非常充足，庫裏藏有來福槍一萬支，輕砲五十至六十尊，山砲三尊，平射砲一二尊。我們不曾奪獲過一架飛機，但在「第三次圍勦」時，曾射下一架，不過落在他們的後方。在這時期，國民黨運輸軍火的方法非常笨拙，因此在戰時奪獲我們所需要的軍火，是非常容易的。

在「第三次圍勦」開始之後，我又回前線來，在前線總部裏負責少年團的工作，當時我們的部隊正向贛西移動，直到「第四次圍勦」結束，我的工作才告一段落，轉到瑞金出席第一次全蘇維埃代表大會，這是一九三一年底的事。這時候，我在革命軍事委員會電訊局裏担任一個非常重要而機密的工作。我在一九三一年已正式入黨。

一九三二年的上半年，我被派任婦女義勇團的團長，隊員約二百人。這義勇團是在雩都組織的，接着就開到都城瑞金，委託紅軍大學訓練。團員都是農民，大半是當地的人，在大學裏受了六個月的訓練之後，便派到各農村工作。在這時候，因爲我領導他們，所以亦經常上軍事科學的課，隨後又被准許昇爲紅大的正式生。在學校裏，我得到了許多軍事學識，政治水準亦大大提高，我是一個很優秀的學生，在班裏考得第二名。

一個中學生名叫梁英，亦考入紅大，我們是最早進紅大的兩個婦女幹部，工作跟男人一樣緊

張．梁英因缺乏軍事工作的經驗犯了許多錯誤．而當時又正是黨內因立三路線發生糾紛的時候，梁英還同情反動派，否認幾個被罰的同志是反革命的，因此學校在她畢業之前把她開除．當時她已經結婚了，至這個人後來如何，我一點亦不知道．

在我畢業之前，政府派我到後方去視察救護工作．回來之後，我便担任紅大某班的講師，作建立新政權和創立紅軍等問題的演講．但一個月後，當局又把我調到前方，在前方司令部裏任職．稍後才回後方，直到長征開始，我一直担任講師的工作．

那是一九三四年的事：有一次，我正在後方，萬安和贛州之間視察黨務，無意間竟與他們遭遇，因此不得不從事作戰．當時我被當地的三百士兵推為司令官，一直戰了兩個鐘頭．後來他們終於被迫退却．我不曉得我究竟射死了人沒有，但我的鎗法一向是相當準確的．我覺得這是我最快活的一天．對方得到這支軍隊是我指揮的消息，非常害怕，聽說他們曾這樣說：朱德的老婆來了，她是非常兇猛的．」自此之後，我便得到「女司令」的綽號．

在長征中，我一直跟朱德在一起，我們每天見面，但從未關心他穿的吃的等事情，這是他的勤務兵的工作，朱德並不喜歡女人只做家務．我當時忙得不可開交，連自己的衣服都沒工夫洗滌．在長征中，我的工作是組織民衆．

我在長征中沒有得到什麼特殊的經驗，長征對於我正如長途的散步一樣．有時我亦騎馬，但十分之九的時間，却跟別人一樣步行，除負責着自己的行李外，有時還幫着身體較弱的人背負重

物。我時常提着三四支步鎗，想藉此鼓勵別人家，朱德亦常常這様，他騎馬和步行的時間各佔一半，給別人留個榜様。我們穿的只是草鞋，一到夜裏，大家便一道宿營，各個領袖，如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都聚在一起。我們的隊伍分成兩列，有時前鋒和後衛要相离竟達兩天之久。

我們在路上經過的每個地方召開羣衆運動，散播政治的宣傳。沒收地主的財產，把牠部份分給窮人，所以老百姓們非常歡迎我們，尤其是四川，貴州，湖南和雲南的民衆，歡迎我們尤其熱烈。

我想在長征中，最困難的地方該是四川的卓克基和毛兒蓋。在這兩個地方，我們一點吃的東西亦沒有，只好用生麥，青草和樹皮充飢。在蠻子區的獨軍的戰事亦是非常艱險的。在草原上，蠻子的騎兵時作奇襲，我們的戰士又因天氣奇冷，不能發揮戰鬥能力，在這時候，許多身體衰弱的，都死去了。

我前後經過兩次草原。第一次，我們跟毛澤東的部隊同時橫渡草原，當時分爲兩路，毛澤東的一路結果無事渡過，而我們的，在半路爲漲水的黃河阻住。牠橫亙在草原的中央，我們感到的蓄惱，正如中國之對於黃河一樣。因此我們又被迫回頭，在西藏度過冬天，每日吃着馬肉，犛牛肉，羊肉和牛肉，朱德亦在這裏得到牠那變碩大的一見到沒有紅星章的人便高聲吠的康狗。

朱德自在卓克基與毛澤東分手之後，相互間差不多有一年未曾會面。當時毛率領的有三軍，朱領的則爲兩軍。

一九三六年，我們開始跟徐向前的五個軍，總共七個軍，由西藏出發。同年十月，我們終於在甘肅的會寧會師。

當我到了陝北，我便入黨校唸書，現在則入抗日軍政大學。我現在的希望便是能得跟賀龍的妹妹一樣，担任實際的軍事工作，做個軍事的指揮官。朱德很同情我這個志願。他要我求得充分的軍事學識，以便在將來能够指揮軍隊，我想我一定能够成功——我對軍事科學已略有心得，我從朱德處學習了許多，就是他跟別人的談話，我亦是小心諦聽的。

在紅軍主力中，只有兩個女人曾充任過指揮官，一是賀龍的妹妹賀英她已在戰場戰死，另一個便是我。此外，徐向前曾在四川組織過一隊女兵，把指揮權付託給兩位女性，一是張珍珠，一是張冠蘭現在她們跟徐向前一道在寧夏。這隊女兵約有八百個女戰士，現在却已改由王聰揚指揮。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剛發生西安事變的時候，他們正與當地的回教徒苦戰。第四方面軍當時的環境非常艱難，因爲當地的回教徒都擁護幾位馬將軍，而紅軍不曉得應該怎樣在政治工作上去和他們親近，以致相互的關係弄得很不好，許多四川女兵給馬鴻逵俘去，有的被變賣，有的被迫嫁給回教徒，另一些則強迫担任苦役，另一些則被當地的回教官兵砍殺。

究竟是什麼力量影響了我，使我成爲一個革命者，以及目下跟國民黨合作，在我心理上是否難以接受你這兩個問題，我可以這樣回答。自然，迫我成爲一個革命者的原因，客觀上是因爲我生活的貧困，而主觀上則因爲我受了大革命，共產黨和牠的解放被壓迫的人類的思想所影響。其

次，朱德給我的影響亦非常大，不過，他不僅影響我一人，這是不用說的。

在這長期的戰鬥中，我有許多很要好的同志被殺了，但這並不會使我跟國民黨合作不來，因為我痛恨日本帝國主義者。當然，我們階級意識仍然是保留着的，但我卻十分願意擁護民族統一戰線。過去長期的可怖的內戰，我們全身受過，而現在，要使中國得救，除各階級各黨派通力合作之外，再沒有第二條道路，紅軍全體戰士，無不痛恨日本侵略者，巴不得有一天能夠跟日本人作戰。紅軍跟日軍在防地上雖然沒有直接的接觸，但從我們整個的宣傳上看，我們之決心抗日，卻是一點疑問亦沒有的」。

朱德自傳

輯譯者　紹　源

發行者　大地出版社　重慶　上海

印刷者　大地出版社

經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初版發行

S. 1——3000